

南京金陵刻經處刊印華嚴宗經論的歷史考察與學術貢獻

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 碩士生
郭明儀

摘 要

南京金陵刻經處由楊文會等人在「末法蒼茫、宗風歇絕」的清代末期成立以來，在佛教刻經事業上發揮了重要的作用，楊文會積極蒐求海內外佛教經論，其中華嚴宗尤其是賢首法藏的著作佔據了一大部分，這些重要著作諸多遺失，甚至部分經論如賢首法藏之《華嚴經探玄記》「宋元以來，無人得見」，楊文會將其在國內刊印流通，為華嚴宗的研究提供了較為系統的資料。楊文會管理金陵刻經處，有完備的章程，不僅刊印標準嚴格，其本人更是對亟付剞劂的經論親自校勘，去偽存真，孜孜矻矻用心佛教經典的刊印流通，為學術研究提供了極大的方便。在金陵刻經處的影響下，全國各地刻經處相繼而起，互相合作，對於華嚴宗經論的保存和傳承亦是做出了極大的貢獻。金陵刻經處在歷代熱心人士的用心經營之下，至今仍在刊印華嚴宗教典，作為刻經中心，仍發揮著舉足輕重的作用。

關鍵詞：金陵刻經處、楊文會、華嚴宗經論、賢首法藏

一、前言

19 世紀末與 20 世紀初期，我國傳統文化在與西方文化的交融碰撞中，出現了新的局面，此一時期，社會動蕩不安，救亡圖存呼聲高漲，有志之士也在有意振興佛教，居士楊文會（1837-1911）創辦金陵刻經處刊印佛教經典即為一項里程碑之舉。趙朴初（1907-2000）〈金陵刻經處重印經書因緣略記〉曾讚歎楊文會：「近世佛教昌明，義學振興，居士之功居首。」¹在「末法蒼茫、宗風歇絕」之會，楊文會奮起，孜孜矻矻，對佛教文化事業的傳播與弘揚做出了諸多的貢獻，梁啟超評論其學問與影響：「夙棲心內典，學問博而道行高。晚年息影金陵，專以刻經弘法為事。……晚清所謂新學家者，殆無一不與佛學有關係，而凡有真信仰者率皈依文會。」²

金陵刻經處自清同治五年（1866）創立以來，廣求海內外佛典，其中一個重要的部分即為華嚴宗經論。《華嚴經》傳入中國以後，先後形成了六十卷本、八十卷本與四十卷本三種漢譯本，簡稱《六十華嚴》、《八十華嚴》與《四十華嚴》。《六十華嚴》由東晉僧佛陀跋陀羅等人譯出，又稱舊《華嚴》、晉譯《華嚴》；《八十華嚴》於唐武周時期實叉難陀等人譯出，又稱新《華嚴》；《四十華嚴》於唐德宗貞元年間般若三藏譯出，全稱《大方廣佛華嚴經入不思議解脫境界普賢行願品》，簡稱《普賢行願品》，內容上相當於新、舊《華嚴》之〈入法界品〉。唐代完成《八十華嚴》與《四十華嚴》的翻譯之後，古代大德與文人學者對《華嚴經》的研究亦是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繁榮與昌盛，影響甚深者，杜順和尚（557-640）、雲華智儼（602-668）、賢首法藏（643-712）、清涼澄觀（738-839）、圭峰宗密（780-841），被後世尊為華嚴五祖。唐武宗會昌法難之後，華嚴教典銷毀衆多，《華嚴經》研究亦隨之衰落，雖時有中興，然終不及盛唐。

清末民初，楊文會志在投身於佛教典籍的整理與校刻，終其一生重視華嚴宗經論的研習，訪求了諸多流失在日韓等地的華嚴宗經典，在楊文會等人的呼籲倡導之下，全國各地刻經處繼起，刻印了數量可觀的華嚴宗教典，對當時以至如今華嚴宗經典的流通、教學、傳播與學術研究等各方面產生了重要的影響。本文即從金陵刻經處對華嚴宗經論刊印的歷史考索出發，進而探討其對當世的學術貢獻。

¹ 趙樸初，《趙樸初文集》（北京：華文出版社，2007年），頁488。

² 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頁99。

二、楊文會刊印華嚴宗經論之貢獻與成就

華嚴宗依《華嚴經》立教，兩晉南北朝以來，共形成了《六十華嚴》、《八十華嚴》與《四十華嚴》三種翻譯版本，以及諸多的釋經之作，隋唐時期發展到鼎盛。宋元以後，華嚴宗的發展呈現衰頹趨勢，清末民初之交，在國家政權與民生安全面臨危機，以及傳統的民族文化面臨衝擊的背景之下，一些仁人志士發憤圖強，為民族的振興做出了巨大的努力。楊文會居士等人創立金陵刻經處刊印佛經與經論以及聚眾講學，對此一時期佛教的發展做出了不朽的貢獻。

楊文會，字仁山，安徽石埭（今安徽池州）人，在近代佛教史上繼往開來引領佛教的復興，被譽為我國近代佛教復興之父。楊文會對近代佛教的貢獻是多方面的，沈曾植概括為「論師、法將、藏主、經坊」³，集創辦金陵刻經處刊印佛經、蒐集散佚經論保存文獻、開辦祇洹精舍培育人材以及親自教學闡揚佛法之功德於一身，影響深遠。楊文會在同治五年（1866）組織創辦金陵刻經處，1907年在刻經處設立祇洹精舍，除了受到社會環境的影響之外，本人也是虔誠的佛教弟子，對於華嚴宗的貢獻，可以分為三點來討論。

其一，認可華嚴宗經論內容並傳授於學人。楊文會棲心華嚴、唯識與淨土教典，梁啟超指出：「文會深通『法相』、『華嚴』兩宗，而以『淨土』教學者。學者漸敬信之。」⁴楊文會生前，曾計劃編纂《大藏輯要》，對於華嚴宗經典，蔣維喬《中國佛教史》記載：「（楊文會）所輯《華嚴著述輯要》，大半皆中土久佚之本；晚歲，更得二祖之《搜玄記》，三祖之《探玄記》，乃手輯《賢首法集》一百數十卷，以《探玄記》冠其首。」⁵楊文會亦曾多次提到華嚴經論教理以及其流通與教學的重要性，如楊氏在〈十宗略說·賢首宗（一名華嚴宗）〉提到：

《華嚴》為經中之王，秘於龍宮。龍樹菩薩乘神通力誦出略本，流傳人間。有唐杜順和尚者，文殊師利化身也，依經立觀，是為初祖。繼其道者，雲華智儼、賢首法藏，以至清涼澄觀而綱目備舉。於是四法界、十玄門、六相、五教，經緯於疏鈔之海。而《華嚴》奧義，如日麗中天，有目共睹矣！後之學者，欲入此不思議法界，於諸祖撰述，宜盡心焉！⁶

³ 楊文會著，張華選編，《楊仁山文集》（北京：商務印書館，2018年），頁538。

⁴ 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頁99。

⁵ 蔣維喬，《中國佛教史》（北京：中華書局，2015年），頁371。

⁶ 楊文會著，張華選編，《楊仁山文集》，頁89。

楊文會稱《華嚴經》是「經中之王」，傳入我國以後，唐代杜順和尚「依經立觀，是為初祖」，其後又有雲華智儼、賢首法藏、清涼澄觀闡揚《華嚴》經義，因此《華嚴》之奧義「如日麗中天，有目共睹矣」。楊文會提到的「四法界、十玄門、六相、五教」則是華嚴宗哲學思想體系的一部分，也是佛教中國化進程中形成的璀璨章節，如陳永革在〈『教宗賢首』：論楊文會《賢首法集》及民國華嚴宗復興〉一文中指出：「華嚴宗是中國化佛教的一個代表性宗派，注重教理辨析，以五教判攝、法界統觀、六相圓融、十玄無礙、三觀修行等學說，構成中國化佛教哲學的典範。」⁷楊文會設想編印《大藏輯要》，並撰寫了〈敘例〉，文中指出：「經分大小二乘，大乘以《華嚴》為首。凡賢宗及各家著述，發明《華嚴經》義者，概歸此部。」⁸於〈與某君書〉言：「鄙人初學佛法，私淑蓮池、憨山。推而上之，宗賢首、清涼。再溯其源，則宗馬鳴、龍樹。此二菩薩，釋迦遺教中之大導師也。」⁹其在〈《陰符經》發隱〉提到：「夫論道之書，莫精於佛經。佛經多種，莫妙於《華嚴》。悟《華嚴》宗旨者，始可與談此道矣。」¹⁰諸如此類。

楊文會以為「大乘以《華嚴》為首」，嘗以《華嚴》會通儒道二家經典，如《論語·公冶長》載：子謂子貢曰：「汝與回也孰愈？」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子曰：「弗如也！吾與汝弗如也。」楊文會〈《論語》發隱〉云：「《維摩經》中，三十二菩薩，皆以對法顯不二法門。六祖《壇經》，以三十六對，顯禪宗妙義。子貢聞一知二者，即從對法上知一貫之旨也。若顏子聞一知十者，乃證華嚴法門也。經中凡舉一法，即具十門，重重無盡，名為圓融法界。子貢能知顏子造詣之深，復能自知修道分齊，故孔子印其弗如而與之也。」¹¹孔子問子貢與顏回相比，誰更勝一籌？子貢回答說顏回「聞一以知十」，他自己則「聞一以知二」，針對子貢的回答，楊文會以《維摩經·入不二法門品》之文殊師利等三十二位菩薩與維摩詰居士的關於入不二法門的對答、《六祖壇經》記載的惠能交代弟子們「道貫一切經法」的三十六對法，以對應子貢之「聞一以知二」；又以《華嚴經》「凡舉一法，即具十門」之奧義對應顏回「聞一以知十」之聰慧與精深造詣，而以圓融儒佛之說。又如《道德經》「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人之生動之死地者亦十有三」下，楊文會〈《道德經》發隱〉云：「『生之徒』三句，最難發明，須用《華嚴》十世法門釋之，則句句有著落矣。一切釋典，皆論三世，獨《華嚴》論十世。」¹²《道德經》「生之徒」三句，楊文會以為「最難發明」，須以《華嚴經》

⁷ 中國佛教協會，「金陵刻經處與近現代佛教義學研討會」網站，<https://www.chinabuddhism.com.cn/special/jlkjc/yxyt061/2016-07-08/10968.html>（2016/07/08）。

⁸ 楊文會著，張華選編，《楊仁山文集》，頁 258。

⁹ 楊文會著，張華選編，《楊仁山文集》，頁 334。

¹⁰ 楊文會著，張華選編，《楊仁山文集》，頁 431。

¹¹ 楊文會著，張華選編，《楊仁山文集》，頁 415-416。

¹² 楊文會著，張華選編，《楊仁山文集》，頁 445。

之十世法門來解釋，《華嚴經》十世即過去世、現在世、未來世各有三世，總共為九世，九世圓融和合為一世，故有十世。可見楊文會頗為認同與用心於華嚴教典。

楊文會對佛教的認知以及聚徒講學，影響了眾多僧人、居士與學者，深受時人崇敬，沈曾植、梁啟超、章太炎、太虛大師等人皆與金陵刻經處有著殊勝的因緣。楊文會積極接受西學，早在 1897 年與譚嗣同、繆荃孫等人成立金陵測量會，學習西方自然科學。祇洹精舍成立後，親自講學，中西結合，聘任李曉敦講授漢文，蘇曼殊講授英文與梵文。精善《華嚴》者如參與戊戌維新運動之譚嗣同，受楊文會啟發，吸收《華嚴》義理撰成《仁學》一書。近代華嚴宗發展的關鍵人物，冶開法師（1852-1922）座下弟子月霞法師，在南京期間與楊文會及門人往來密切，為其後創辦華嚴大學宣揚《華嚴》義理奠定了基礎。冶開法師的另一位弟子應慈法師自號「華嚴座主」，除了協助月霞法師創辦華嚴大學，另在常熟虞山興福寺成立華嚴講堂，一生致力於華嚴學的弘揚，在上海與楊文會門人蔣維喬等人重編《華嚴疏鈔》，流通經典。在這樣的組織下，也影響了寺院辦學以提高僧人知識水平，有利於發展佛教教育，同時楊文會等人講學也滲入政治生活中，影響著當時的社會風氣。

其二，積極蒐求海內外華嚴典籍與古代高僧大德佚書。在搜求華嚴宗經論上，楊文會可謂盡心備至。楊氏刊印華嚴著述，廣求國內以及日本、朝鮮等地之善本，根據楊文會〈佛學書目表·華嚴部〉，共羅列五種華嚴典籍，其中三種是金陵刻經處刻版，分別是：唐澄觀撰《華嚴疏鈔》二百二十卷，楊文會指出此書「以四分科經，發揮精詳，後人得通《華嚴》奧旨者，賴有此書也」；唐李通玄撰《華嚴合論》一百二十卷，楊文會提到此書「提倡圓頓法門，與禪相為表裏」；楊文會輯《華嚴著述集要》，楊謂此集「薈萃各家撰述，學《華嚴》者，萬不可少」。¹³澄觀所撰之《華嚴疏鈔》是對唐譯八十卷本《華嚴經》的疏解之作，是《大方廣佛華嚴經疏》與《大方廣佛華嚴經隨疏演義鈔》的合刻本，原本各自單行，後世將二者合為《華嚴經疏鈔》，簡稱《華嚴疏鈔》。李通玄撰《華嚴合論》，即《華嚴經合論》，亦稱《大方廣佛華嚴經合論》，是《華嚴經》經文與《新華嚴經論》的合刻本，《新華嚴經論》是李通玄論述八十華嚴之作，後經唐代僧人志寧與北宋僧人惠研整理，將此書內容匯入經文，名曰《華嚴經合論》。李通玄《華嚴合論》與澄觀《華嚴疏鈔》，此兩部著作是研讀《華嚴經》的重要參考，同時澄觀《大方廣佛華嚴經疏》受到了李通玄的影響，而且澄觀享有「華嚴疏主」之美譽，如魏道儒在《中國華嚴宗通史》中提到：「澄觀的全部著作據稱有 400 餘卷，故有『華嚴疏主』之譽。他系統注解八十華嚴的著作是《大方廣佛華嚴經疏》（簡稱《華嚴經疏》）六十卷。……此書雖有不少發揮，而且接受了李通玄的影響，……」¹⁴楊文會編輯「《華嚴著述集要》二十九

¹³ 楊文會著，張華選編，《楊仁山文集》，頁 241。

¹⁴ 魏道儒，《中國華嚴宗通史》（南京：鳳凰出版社，2008 年），頁 171-172。

種」，¹⁵據羅琿《金陵刻經處研究》記載：「(《佛學書目表》)所載《華嚴著述集要》一種，金陵刻經處見存經版中無此書經板，所見書目及館藏中均無此書記載。」¹⁶李通玄《華嚴合論》與澄觀《華嚴疏鈔》的刊印，代表了楊文會對華嚴宗的學術眼光與立場，如陳永革〈『教宗賢首』：論楊文會《賢首法集》及民國華嚴宗復興〉指出：「金陵刻經處先後復刻這兩部闡釋唐譯《八十華嚴》的巨著，頗能反映楊文會對華嚴宗的弘傳立場。」¹⁷

此外，根據歐陽漸（1871-1943）〈楊仁山居士傳〉，楊文會曾自日本學者南條文雄處「由海外得古德逸書三百種，訣其最善者刻之」。¹⁸楊文會推崇賢首法藏著述，親自蒐集《賢首法集》一百數十卷，在友人南條文雄協助下得到的「古德逸書」，其中關於「賢首《十疏》」，〈《賢首法集》敘〉提到「已得其六」：

世之學《華嚴》者，莫不以賢首為宗。而賢首之書，傳至今日者，僅藏內十餘卷耳。後人閱清涼《大疏》，咸謂青出於藍而青於藍。因欲易賢首宗為清涼宗，蓋未見藏公全書故也。近年四海交通，得與東瀛南條文雄遊，求覓古德逸書數百種。所謂賢首《十疏》者，已得其六。方知清涼《大疏》，皆本於《探玄記》也。賢首作《新華嚴疏》，未竟而卒。後二十七年，清涼乃生。及其作疏，一宗賢首，豈非乘愿再來，闡發大經乎？今將賢首著述，去偽存真，匯而刊之，名曰《賢首法集》。世之學《華嚴》者，其以是為主臬也可。¹⁹

楊文會提到，世人學習《華嚴經》多宗賢首法藏，賢首法藏一生著述頗豐，據湯用彤《隋唐佛教史稿》統計，「其所撰現存者二十三部，知名而佚失者約亦有二十餘部。」²⁰然而賢首法藏的著作在經過會昌法難之後，散佚衆多，傳至楊文會所處的時代，所見「僅藏內十餘卷耳」。因其得益於海內外交通之方便，經南條文雄協助，搜求賢首法藏逸書數種，匯而成《賢首法集》百餘卷二十二種。楊文會親自校對，指出了過去對賢首法藏的誤解，以為清涼澄觀《大疏》（《大方廣佛華嚴經疏》）較賢首法藏「青出於藍而青於藍。因欲易賢首宗為清涼宗」，楊氏卻以為清涼澄觀此書本於賢首法藏《探玄記》（《華嚴經探玄記》）。此外，楊文會對搜求的賢首法藏遺著進行了「去偽存真」的工作，並非全部收錄在《賢首法集》中，其在〈《賢首法集》敘〉提到《華嚴策林》、《普賢觀行法門》、《華嚴經問答》、《華嚴游心法界

¹⁵ 周谷城主編，《中國學術名著提要·宗教卷》（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97年），頁534。

¹⁶ 羅琿，《金陵刻經處研究》（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10年），頁219。

¹⁷ 中國佛教協會，「金陵刻經處與近現代佛教義學研討會」網站，<https://www.chinabuddhism.com.cn/special/jlkjc/yxyt061/2016-07-08/10968.html>（2016/07/08）。

¹⁸ 楊文會著，張華選編，《楊仁山文集》，頁546。

¹⁹ 楊文會著，張華選編，《楊仁山文集》，頁259。

²⁰ 湯用彤，《隋唐佛教史稿》（北京：中華書局，2016年），頁168。

記》四種「均係贗作，故不收錄」。²¹楊文會對《賢首法集》所收錄賢首法藏之作，從自己的眼光和對內容的裁奪，進行了較為認真嚴格的擇取，因此楊氏自謂「世之學《華嚴》者，其以是為圭臬也可」，這種評價較確。

楊文會提到的「賢首《十疏》」，其在〈《賢首法集》敘〉之「《入楞伽心玄義》」條下指出：「賢首十疏中，已得者，《華嚴探玄記》《梵網經疏》《心經略疏》《起信義記》《十二門論宗致義記》《法界無差別論疏》及此卷。未得者，《新華嚴經》未完之疏，幸有清涼《疏鈔》補其缺略；《密嚴經疏》，得日本殘缺寫本，核其文義，不類賢首之作；《法華經疏》，無可尋覓，惜哉！」²²為賢首法藏主要著作，楊文會「已得者」七種皆收錄在《賢首法集》中。

對「賢首十疏」以及此集中其他著作，楊文會說明了收錄之緣由與得某書之來由，並且對部分著作進行了對閱和認真學習後抒發己見，更對一些古本卷數做了更改。如「晉譯《華嚴經探玄記》」條目下，楊文會云：

至相作《搜玄記》，文義甚略。賢首繼之，作《探玄記》，發揮盡致。海東、元曉得之，立命弟子分講，遂盛行於新羅。其時唐土重譯《華嚴》既成，學者舍舊從新。賢首因疏新經，未及半部而卒。其徒慧苑足成之，命曰《刊定記》。多逞己意，違背師說，清涼疏內辨之甚詳。今以二本對閱，方知清涼作疏，全宗此記，鈔錄原文十之五六，其為古德所重如此。而蕩益輒議之曰：「經既未全，疏亦草略。」蓋係臆度之辭。此記宋元以來，無人得見，蕩益何從而見之耶？東洋刻本，未會經文，單記二十卷，足六十萬言。今以經合於記，厘為百二十卷。另有《華嚴文義綱目》一卷，與此記同處頗多，故不列入。²³

楊文會於此段文字說明了賢首法藏《華嚴經探玄記》是疏解晉譯《華嚴經》（《六十華嚴》）的著作，而且是在至相（智儼）《搜玄記》（《華嚴經搜玄記》）的基礎上發揮而成，朝鮮僧人海東、元曉命弟子據此講學，此書因此在新羅（今屬朝鮮）盛行。但是武則天時期《八十華嚴》被翻譯出以後，學者棄舊從新，此書並沒有完成，餘下的半部餘由弟子慧苑（673-743？）完成，名曰《刊定記》，但楊文會以為《刊定記》一書「多逞己意，違背師說」，在清涼澄觀的著作中辯論詳實。楊氏對閱賢首法藏《華嚴經探玄記》與清涼澄觀《大方廣佛華嚴經疏》發現，清涼澄觀此疏「全宗此記，鈔錄原文十之五六」。同時，楊文會在這段文字中提到此書來由是東洋（日本）刻本，且「未會經文，單記二十卷，足六十萬言」，楊氏將賢首法藏《華嚴經

²¹ 楊文會著，張華選編，《楊仁山文集》，頁 263。

²² 楊文會著，張華選編，《楊仁山文集》，頁 260。

²³ 楊文會著，張華選編，《楊仁山文集》，頁 259-260。

探玄記》匯入《華嚴經》經文，刊定為一百二十卷。楊文會兩度提及清涼澄觀《大方廣佛華嚴經疏》的內容多來自賢首法藏《華嚴經探玄記》，一方面反映了其對賢首法藏著述的重視與推重，另一方面也能看出其在所羅列的計劃刊刻書目中，進行了仔細的校讀與分析。並且，楊文會還提到賢首法藏《華嚴經探玄記》「宋元以來，無人得見」，也就是說在楊文會看來，《華嚴經探玄記》是首次被發現，在此之前並未有流通版本，至關重要，這或許是楊文會將此書列入《賢首法集》首位的原因之一。蔣維喬在《中國佛教史》亦提到：「此《記》自宋元以來，無人得見之；今復歸本國，於是賢宗一脈相傳之經疏，至此復備。」²⁴楊文會將賢首記文匯入佛經的計劃工作，對華嚴宗的發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動作用，但是據徐文蔚²⁵所作《華嚴三昧章》跋語，此書當時並未刊行。²⁶

又如楊文會在「《華嚴三昧章》」條目下解說云：

新羅崔致遠作《賢首傳》，用《華嚴三昧觀》直心中十義，配成十科。證知此章即觀文也。東洋刻本，改其名為《發菩提心章》，於表德中，全錄杜順和尚《法界觀》文，近三千言。遂疑此本非賢首作。庚子冬，南條文雄游高麗，得古寫本，郵寄西來，首題《華嚴三昧章》。雖校盡善，登之梨棗。因來本作章，故仍其舊。尚有《華嚴世界觀》，求而未得也。²⁷

徐文蔚《華嚴三昧章》跋語鈔錄了楊文會與南條文雄書信中提到的獲得此書之經過：

謹案：唐賢首國師著述，中土久佚，經楊仁山先生轉輾求得者，為《華嚴探玄記》（未刻）、《梵網經菩薩戒本疏》、《入楞伽心玄義》、《起信論義記》、《別記》、《法界無差別論疏》、《十二門論宗致義記》、《華嚴義海百門》（以上各種已刻行），而《楞伽經疏》七卷、《法華經疏》七卷、《華嚴策林》一卷（日本續藏有此書，先生謂係贗本）、《華藏世界觀》一卷，及此《三昧章》，則求之日本亦不可得。

日本南條文雄君，嘗覆先生書云：「法藏所作《三昧觀》者，《義海百門》或《華嚴雜章》之異名也。」先生辨其非是，覆書云：「法藏所作《華嚴三昧觀》，崔致遠作《別傳》，已用其『直心』中『十心』名目，貴國所刻《發菩提心章》，

²⁴ 蔣維喬，《中國佛教史》，頁371。

²⁵ 徐文蔚（1878-1937），一名文蔚，字蔚如，號藏一，浙江海鹽人，近現代著名佛教居士。曾創立北京刻經處、天津刻經處，致力於佛教經論尤其是華嚴經論的蒐集、整理與校刻，被時人尊稱為「華嚴學者」。

²⁶ 〔唐〕法藏，《華嚴三昧章》（南京：金陵刻經處，1917年），頁14。

²⁷ 楊文會著，張華選編，《楊仁山文集》，頁261。

錄『十心』之文，與崔同，并有三十心。而與《法界觀》及他種湊合而成。謹知《華嚴三昧觀》當有全本流傳高麗也，祈請駐韓道友訪之。」又書云：「近聞貴宗同人往高麗布教者頗多，唐法藏所作《華嚴三昧觀》《華嚴世界觀》二種，高麗或有存者，乞寄信求之。」歲庚子，南條君遊高麗，訪得此本，寄先生書云：「在韓日得唐法藏《華嚴三昧章》寫本，因奉贈一本，未知此果與《華嚴三昧觀》同乎？抑異乎？」先生覆書云：「《華嚴三昧章》與《菩提心章》同，而闕《法界觀》之文，始知二書同出一本，即《華嚴三昧觀》無疑矣。²⁸

由以上兩段文字可知，楊文會訪求《華嚴三昧章》歷時既久，且輾轉波折而得之，徐文蔚提到：「先生之於此書，歷數十年之久，徧行中日韓三國，一再訪求，僅乃得之，至足寶已。」²⁹此書求之日本而未得，但在與南條文雄往來書信中，提到法藏《華嚴三昧觀》、崔致遠《別傳》（《賢首傳》）、日本刊刻《發菩提心章》（《大正藏》刻本）以及杜順《法界觀》之關聯，以為《發菩提心章》全錄杜順《法界觀》，並非是賢首法藏所作，因未睹《華嚴三昧觀》之全本，亦無法得出以上諸書與此書的具體聯繫，所以楊文會曾兩次寄信給南條文雄尋求此書。庚子冬（1900），南條文雄遊高麗，訪得《華嚴三昧章》古寫本，遂寄與楊文會一本，書首題為「華嚴三昧章」。楊文會在對校《華嚴三昧章》與《華嚴三昧觀》二書之後，「證知此章即觀文也」，以為二者是法藏所撰寫的同一部作品，因寄來的本子用「章」，故付之梨棗時亦以《華嚴三昧章》作為書題。

楊文會得到《華嚴三昧章》之後，生前並沒有來得及刊刻此書，徐文蔚跋語載：「先生得是寫本，識以數語，謂將登之梨棗，而珍藏篋衍，未遑付梓，先生西歸，忽忽六載，同人幾不復知有此事，乃者覆檢先生遺稿，始知梗概，覓得底本，亟為校刻，以竟先生未竟之志。」³⁰楊文會於《華嚴三昧章》「識以數語」，亟付剞劂之前，藏之箱篋，但未遑及付梓，楊氏即歸道山，自此六年以後，同仁學者已經不再關注此書，亦不知有此事，徐文蔚整理楊氏遺稿復得此書，乃校刻而登之梨棗「以竟先生未竟之志」。

根據智輿居士³¹在民國六年（1917）刻本《華嚴三昧章》書衣右側手書題記可知，《華嚴三昧章》亦在《華嚴著述集要》之列，但是當時並未刊印此書，題記云：

²⁸ 〔唐〕法藏，《華嚴三昧章》，頁 13。

²⁹ 〔唐〕法藏，《華嚴三昧章》，頁 13-14。

³⁰ 〔唐〕法藏，《華嚴三昧章》，頁 14。

³¹ 智輿居士，據孫中旺〈陳子彝對圖書館事業的貢獻述略〉載錄：「陳子彝（1897-1967），原名華鼎，字子彝，以字行。曾用名蘇民，號眉盒，別號智輿居士，室名帝網精舍、寶漢書樓等，昆山陳墓鎮（今錦溪鎮）人。曾師從金松岑和章太炎等著名學者，學識淵博，著述弘富，兼善書畫、篆刻及攝影。陳子彝一生大部分時間從事圖書館工作，先後在江蘇省立蘇州圖書館、上海南洋中學圖書館和上海師範學院圖書館任職多年，並曾為家鄉的錦溪圖書館搜集文獻，對這些圖書館事業的發展

「丁酉春，請得賢首國師《華嚴三昧章》以補所藏光緒間印本《華嚴經著述集要》之闕。」³²但是依照智輿居士所處的年代，「丁酉春」當為 1957 年，距楊文會得到此書之 1900 年，已經過去 58 年之久，此項記載可作為參考。

其三，刊印華嚴宗教典使其流通。金陵刻經處刻印佛經，計劃周全，楊文會編訂〈佛學書目表〉是刻經處準備刊印的佛經目錄，其分類因承《閱藏知津》，將「華嚴部」列居首位。對於浩瀚的大藏經，選輯為《大藏輯要》，在〈敘例〉中將華嚴經論列居首部。楊文會計劃刊印《賢首法集》，不僅在內容上仔細校閱，有所抉擇，對於所收錄部分古本卷數亦做了更改，凡有六部，其一，《梵網經菩薩戒本疏》，「古本六卷，今作十卷」；其二，《大乘起信論義記》，「古本三卷，今作七卷」；其三，《十二門論宗致義記》，「古本二卷，今作三卷」；其四，《法界無差別論疏》，「古本一卷，今作二卷」；其五，《一乘教義分齊章》，「古本三卷，今合疏作十卷」；其六，《華嚴經傳記》，「古本五卷，今作三卷」。³³並對以上諸書內容作了考證與分析，如楊文會指出《大乘起信論義記》「實為學摩訶衍之要門也」，於《十二門論宗致義記》云「學者能於此記，及《心經略疏》，融會貫通，則得速入般若波羅蜜門」，《一乘教義分齊章》則謂「賢首宗旨，備於此章」。蔣維喬《中國佛教史》曾評價楊文會之學術造詣指出：「其於賢宗教理，亦復深造自得，於古義頗有發揮，推為晚近中國中興華嚴宗之人，殆無愧也。」³⁴楊文會對華嚴經論做的蒐集、整理、研究與教學等工作，「為研究華嚴宗思想提供了系統的重要資料」。³⁵

在佛經刊印的標準與要求上，楊文會亦是十分謹嚴，其〈與郭月樓書〉載：「譯經之例，唯咒語不翻文義，其餘長行偈頌，均須翻作中國語言，使人通曉。今一律照梵音書之，亦不合傳經之法。……敝處創辦之始，公議條例，凡有疑偽者不刻，文義淺俗者不刻，乩壇之書不刻。謹將原冊奉還，方命之愆，伏祈原宥。」³⁶此段文字可以看出楊氏刊印佛典原則有二，其一，刊印佛經除咒語之外，使用漢語語言，使人明白易曉；其二，凡疑偽者、文義淺俗者與乩壇之書之佛教經論不刊印流通。此種規定，一方面有利於佛教典籍的流通，另一方面也提高了所出版經論的質量。楊文會管理金陵刻經處，有周全的刻經計劃與章程，不惜花費大量的精力與財力積極蒐集重要佛教經論，重視古德撰述與流失海外之要籍，方廣錫曾如是評論楊文會：「在近代中國，在收集未入藏典籍方面，我們還沒有看到有第二人像楊文會這

均作出了重要貢獻。」見孫中旺，〈陳子彝對圖書館事業的貢獻述略〉，《圖書館雜誌》第 314 期（2017 年 6 月），頁 43。

³² 〔唐〕法藏，《華嚴三昧章》。

³³ 楊文會著，張華選編，《楊仁山文集》，頁 260-262。

³⁴ 蔣維喬，《中國佛教史》，頁 371。

³⁵ 樓宇烈，〈楊仁山居士小傳〉，收入《中國現代學術經典（楊文會、歐陽漸、呂澂卷）》（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 年），頁 4。

³⁶ 楊文會著，張華選編，《楊仁山文集》，頁 333。

樣鏗而不捨、孜孜以求、不遺餘力，捨得下功夫、花力氣。這主要是楊文會有一種強烈的事業心、使命感與責任感，實在是我們後人的典範。」³⁷誠哉斯言。楊文會不僅收集未入藏之經論用以編印藏經如此，其於華嚴教典亦是以超乎常人的精力留下了不朽的功績。根據楊文會生前刊印流通的華嚴宗經論數量，姚彬彬依羅瑋《金陵刻經處研究·金陵刻經處的刻印經籍和流通目錄》統計共四十種，³⁸可謂盡心盡力蒐求華嚴宗經典，為華嚴宗的研究提供了豐富的資料，極大方便了出家人、居士、學者的研習與講學。

三、金陵刻經處刊印華嚴宗經論的學術貢獻

跟隨楊文會學習與交流的門人及友人中，徐文蔚創辦北京刻經處以「追隨金陵刻經處，完成楊文會居士的未竟之業，重刻方冊大藏經」。³⁹徐文蔚創辦北京刻經處的直接推動力是完成楊文會未完成的方冊大藏經的願望，但是創立北京刻經處以及徐文蔚後來創辦天津刻經處，為其華嚴經論的刊印提供了平台。徐文蔚致力於華嚴經論的校刻，被尊稱為「華嚴學者」，⁴⁰孟亮〈淺談徐文蔚的佛教刻經活動〉指出：「在民國八年（1919），徐蔚如即與印光法師合訂唐貞觀元年譯本《華嚴經》之校刊記，由江北刻經處刻印；北京、天津刻經處成立後，又細心校刻完成《華嚴探玄記》、《華嚴搜玄記》、《華嚴綱要》、《華嚴經疏科文表解》等重要華嚴典籍。」⁴¹此後，徐文蔚又志刻清涼澄觀《華嚴經疏鈔》，但徐氏並未逮及此書出版即離世，孟亮提到：「雖然《華嚴經疏鈔》在民國三十三年（1944）出版，離他去世已經七年，但是他所做的貢獻確實巨大。」⁴²在一定程度上，徐文蔚一生能夠校刻如此之多的華嚴經論，除了學風高漲的社會背景以及其持之以恆的刻書精神之外，金陵刻經處對其影響也是巨大的。

金陵刻經處成立以後，全國各地刻經處繼起，羅瑋在《金陵刻經處研究》一書中提到：

在金陵刻經處影響下，籌辦金陵刻經處的釋妙空陸續創辦如臯、常熟、杭州、蘇州等地五所刻經處；金陵刻經處發起人之一曹躍湘居士創辦長沙刻經處；楊文會的門人學友徐文蔚、蔣維喬、周叔迦、梅光義、邱晞明等人先後創辦北京刻經處、天津刻經處、江西刻經處。這些刻經處與金陵刻經處分工合作，

³⁷ 方廣錫，〈楊文會的編藏思想〉，《中華佛學學報》第13期（2000年5月），頁192。

³⁸ 姚彬彬，〈現代文化思潮與中國佛學的轉型〉（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5年），頁225-228。

³⁹ 楊之峰，〈北京刻經處述略〉，《新世紀圖書館》第53期（2011年3月），頁88。

⁴⁰ 于凌波，〈中國近現代佛教人物志〉（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1995年），頁464。

⁴¹ 孟亮，〈淺談徐文蔚的佛教刻經活動〉，《法音》第385期（2016年9月），頁45-46。

⁴² 孟亮，〈淺談徐文蔚的佛教刻經活動〉，頁46。

刻印了一批在近代佛教文獻學史上具有一定地位的佛教經籍，其中絕大多數是金陵刻經處《大藏輯要》選刻經籍。⁴³

蔣維喬《中國佛教史》亦有相關記載：

刻經事業，南北各地，亦多有遵守楊文會之遺規，從事續刻《大藏輯要》以期其完成；最著者，有北京刻經處、天津刻經處，所刊經典，板式裝訂，悉與金陵刻經處相同。至重印全部藏經，則有上海頻伽精舍翻印日本弘教書院之小本《大藏經》；商務印書館影印日本之《續藏經》及《漢滿蒙藏四體大藏全咒》。近又有朱慶瀾、葉恭綽等，在上海集合團體，影印宋《磧砂版大藏經》；是亦社會方面熱心佛教者日多，故能有此成績也。⁴⁴

在金陵刻經處的影響之下，北京、天津、常熟等地的刻經處相繼而起，且「多有遵守楊文會之遺規」者，校刻藏經，而且這些刻經處「與金陵刻經處分工合作，刻印了一批在近代佛教文獻學史上具有一定地位的佛教經籍」，如徐文壽等人組織創辦的北京刻經處與天津刻經處即與金陵刻經處來往密切，北京刻經處最早校刻出版的典籍《華嚴經探玄記》，其「部分經版則在南京雕成」。⁴⁵創辦時間稍早於金陵刻經處的江北刻經處，則「與金陵刻經處分工合作，相互補充，不相重複，以共同彙成全藏為目標」，⁴⁶羅琿在《金陵刻經處研究》一書中所列〈江北刻經處見存經籍種類〉表格中，「華嚴部」即有 10 種，亦在首位。⁴⁷常州天寧寺之毗陵刻經處，是冶開法師在弟子行實等人協助下成立，行實精於版本諸學，剃度出家之前受金陵刻經處聘請監刻校對，毗陵刻經處成立後，亦分擔藏經的刊刻工作。楊文會於光緒二十九年（1903）編寫的〈佛學書目表〉，羅琿在〈楊文會《大藏輯要》編輯理念研究——以其選編從日訪回隋唐古德佚書為中心〉一文中指出：「共收入金陵刻經處、長沙上林寺、揚州藏經院、常熟小石山房、杭州慧空經房五家刻經機構所刻印經籍，其中華嚴部 5 種。」⁴⁸這些刻經處在居士團體、文人學者、愛國人士以及熱心佛教事業的社會人士的共同經營管理之下，緊密聯繫在一起，而金陵刻經處以其較大的影響力，加之刻印書籍質量精湛、版式精美、版本優良等特點，所流通刊印的本子被稱之為「金陵本」。

⁴³ 羅琿，《金陵刻經處研究》，頁 254。

⁴⁴ 蔣維喬，《中國佛教史》，頁 339。

⁴⁵ 羅琿，《金陵刻經處研究》，頁 260。

⁴⁶ 羅琿，《金陵刻經處研究》，頁 255。

⁴⁷ 羅琿，《金陵刻經處研究》，頁 255。

⁴⁸ 羅琿，〈楊文會《大藏輯要》編輯理念研究——以其選編從日訪回隋唐古德佚書為中心〉，收入《佛教文化研究（第四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6 年），頁 352。

新中國成立以後，各地刻經處所刻經版以及寺院所藏經版陸續被運往金陵刻經處統一管理，羅琿《金陵刻經處研究》提到：「(1952年6月7日)徐國治就任後，著手對刻經處見存經版經籍開始清理。此後十年中，由於各地刻經處經版遭受破壞，中國佛教協會決定將其運往金陵刻經處，統一整理保管。因此刻經處收藏的經版，除自刻經版外，加上陸續從全國各地刻經處運來的經版，共計150592塊。」⁴⁹羅琿在腳注中提及這是「金陵刻經處藏佛教經籍版片」，⁵⁰並不包括非佛教部分，當然，這也包含了各地大量的華嚴宗經論的經版。時至今日2023年，金陵刻經處仍在刊印華嚴宗教典。2009年，金陵刻經處之刻經印刷技藝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今將2009年與2022年金陵刻經處流通書目之各部類刊印種數列表如下：

序號	部類名稱	刊印種數		序號	部類名稱	刊印種數	
		2009年	2022年			2009年	2022年
01	華嚴部	40	43	14	西土撰集	7	12
02	方等部	56	80	15	禪宗	27	35
03	淨土部	65	96	16	天台宗	5	12
04	法相部	51	56	17	傳記	20	22
05	般若部	29	34	18	纂集	6	4
06	法華部	11	11	19	宏護	5	8
07	涅槃部	6	6	20	旁通	6	6
08	阿含部	10	11	21	導俗	1	2
09	秘密部	29	52	22	專集	30	29
10	大乘律	10	24	23	懺儀	7	23
11	聲聞乘律	18	21	24	藏經	2	1
12	大乘論	25	26	25	膠印本	7	0
13	聲聞乘論	6	6	26	書畫	4	6

對比來看，華嚴部一直佔據較大的比重，雖然種類較方等部、淨土部略少，但總冊數與卷數明顯多於其他部類，較大者如《八十華嚴》共二十四冊四函、《六十華嚴》共十五冊二函、《華嚴經合論》共三十冊六函（2022年列入精品部，木刻水印）以及《華嚴疏鈔》共四十冊八函等，而且以流通書目統計金陵刻經處刊刻經書數目，數字並不準確，如2009年新增書目《華嚴經普賢行願品》共十冊二函，並未列入流通書目中，2022年精品部（木刻水印）之十五部華嚴典籍亦未在流通書

⁴⁹ 羅琿，《金陵刻經處研究》，頁232。

⁵⁰ 羅琿，《金陵刻經處研究》，頁232。

目之列。而且從 2022 年書目表看，《八十華嚴》有流通與精品兩種版本，重要性不言而喻。從佛教經論流通與保存中華傳統佛教文化資料角度審視，金陵刻經處依然發揮著舉足輕重的作用。

四、結論

清代末期，我國民族民生安全面臨深重危機，以及傳統民族文化面臨西方文化的衝擊，值此社會背景之下，佛教華嚴宗經論思想對廣大愛國人士、知識分子產生了重要的影響。當此之時，居士楊文會發心籌建金陵刻經處，刊印流通佛教經論，數十年間，蒐求的海內外佛教經典可謂洋洋大觀，在楊文會等人的悉心管理之下，金陵刻經處自 1866 年創辦，至今 2023 年，歷經 157 年的時間，刊印了大量的佛教經論，在社會風氣影響之下，加之楊文會用心華嚴教典，金陵刻經處刊印典籍中，華嚴宗經論佔據了重要的一部分。

楊文會管理金陵刻經處有周全嚴格的章程，且有一系列的刻書計劃，從華嚴宗經論的角度來看，楊文會所做的工作主要可以歸結為三點：第一，蒐求資料完備。楊文會用心於《華嚴經》，且重視古德所作經論，不僅留心國內典籍，而且積極訪求流失在日韓等地的教典，經日本友人南條文雄處得到「古德逸書數百種」，而對於《華嚴三昧章》一書，孜孜不懈歷經數十年纔獲得此書。第二，擇取底本優良。楊文會刻書原則有三不刻，「凡有疑偽者不刻，文義淺俗者不刻，乩壇之書不刻」，不刻疑偽之書反映其務實的態度，不刻淺俗之書影射其遠見的卓識，不刻乩壇之書顯現其求真的立場。此外，為了方便經典的流通，楊文會還規定，除了咒語之外，悉用漢語語言，可見其用心至深。因金陵刻經處刊印的版本質量精湛、版式精美等因素，因此被稱之為「金陵本」。第三，親自校勘經論。對於華嚴宗經論，楊文會推重賢首法藏著作，手輯《賢首法集》百餘卷，親自校勘，去偽存真，並指出了過去學人對賢首法藏的誤解。

楊文會蒐集整理的華嚴經論，為華嚴宗的研究提供了系統資料。在金陵刻經處的影響下，全國各地刻經處繼起，相互合作，互相扶持，對華嚴宗經典的保存與傳承做出了巨大的貢獻，時至今日，金陵刻經處依然作為重要的佛經刊印中心，發揮著重要的作用。

參考文獻

- 〔唐〕法藏撰，《華嚴三昧章》，南京：金陵刻經處，1917 年。
于凌波，《中國近現代佛教人物志》，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1995 年。
方廣錫，〈楊文會的編藏思想〉，《中華佛學學報》第 13 期，2000 年 5 月，頁 179-205。

- 孟亮，〈淺談徐文蔚的佛教刻經活動〉，《法音》第385期，2016年9月，頁44-47。
- 周谷城主編，《中國學術名著提要·宗教卷》，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97年。
- 姚彬彬，《現代文化思潮與中國佛學的轉型》，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5年。
- 孫中旺，〈陳子彝對圖書館事業的貢獻述略〉，《圖書館雜誌》第314期，2017年6月，頁43-46。
- 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
- 湯用彤，《隋唐佛教史稿》，北京：中華書局，2016年。
- 楊之峰，〈北京刻經處述略〉，《新世紀圖書館》第53期，2011年3月，頁88-90。
- 楊文會著，張華選編，《楊仁山文集》，北京：商務印書館，2018年。
- 趙樸初，《趙樸初文集》，北京：華文出版社，2007年。
- 蔣維喬，《中國佛教史》，北京：中華書局，2015年。
- 樓宇烈，〈楊仁山居士小傳〉，《中國現代學術經典（楊文會、歐陽漸、呂澂卷）》，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頁3-7。
- 魏道儒，《中國華嚴宗通史》，南京：鳳凰出版社，2008年。
- 羅琿，《金陵刻經處研究》，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10年。
- 羅琿，〈楊文會《大藏輯要》編輯理念研究——以其選編從日訪回隋唐古德佚書為中心〉，《佛教文化研究（第四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6年，頁348-392。
- 中國佛教協會，「金陵刻經處與近現代佛教義學研討會」網站，<https://www.chinabuddhism.com.cn/special/jlkjc/yxyt061/2016-07-08/10968.html>（2016/07/08）。

